

# 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1957—1965)

李潜虞

**摘要** 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是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之间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中国高度重视并始终参与的多边外交活动。在第一届大会上,中国的政策既有求同存异的色彩,又强调反帝斗争与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性。在第二届大会上,中国强调美国是亚非国家的主要敌人,号召建立反帝国际统一战线。在第三届大会上,中国反对苏联邀请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并通过支持古巴降低苏联威信。在第四届大会上,中国一方面谴责美国侵略越南,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与苏联进行斗争。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是中国对亚非国家总体政策斗争性不断提升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中国外交 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和平共处 反帝 反修

## 引言

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由印度发起。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分别于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在埃及开罗、1960年4月在几内亚科纳克里、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sup>①</sup>莫希、1965年5月在加纳温尼巴举行。1955年4月6日,在印度的倡议下,亚洲国家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16个国家与会。<sup>②</sup>会后决定在印度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总会,同时还在各国成立分会。1956年2月,中国成立了由郭沫

\* 李潜虞,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北京100037)。

\*\* 本文是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成果,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① 今坦桑尼亚,下同。

② 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崛起与奋进——共和国诞生之初》(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8页。

若任主席的“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该机构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sup>①</sup> 12月,印度建议召开一次由非洲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并探询埃及担任会议东道国的可能性。<sup>②</sup> 1957年2月,埃及同意担任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东道国。<sup>③</sup> 1957年10月21日至23日,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筹备会议在开罗举行。会议决定,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57年12月26日至1958年1月1日在开罗召开。这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由来。随着会议的范围扩大到非洲国家,各国的分支机构也相应地改称为“亚非团结委员会”。

一至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是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其原因在于:首先,万隆会议后,在第二次亚非会议迟迟不能召开的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成为亚非国家相互磋商、彰显力量的重要平台。其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并设立了常设机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sup>④</sup> 这一机制化的进程不但使定期召开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有了保障,而且产生了一个广泛覆盖亚非国家的国际组织。第三,苏联虽没有参加万隆会议却参加了历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并始终是常设书记处的成员。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苏联影响亚非国家的渠道之一。而美国始终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看做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予以严密监视和坚决遏制。中国自始至终参加了历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常设书记处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矛盾也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常设书记处的工作中表现出来,因此,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成为中、美、苏三国角力的舞台。

历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也是中国高度重视的多边外交活动。这首先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苏同盟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安全与亚非国家的反帝斗争是一体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开始让位于反帝统一战线。最终,中国还决定将苏联从反帝统一战线中排除出去。这样,位于广大中间地带的亚非国家就成为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直接同盟军。亚非国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为中国与亚非国家进行广泛接触,争取这些国家采取与中国相同或相近的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恰恰是一种理想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不能不给予充分重视。第二,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定期召开以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发展壮大,坚定了中国关于亚非国家成为重要可依靠力量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不断强化又必然使中国更加重视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因此,在会

<sup>①</sup> 《亚非团结会议》(1957年11月17日),载《亚非团结大会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047-06(1)。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Cairo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 2646, February 19, 1957,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8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671,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D.

<sup>④</sup> 以下简称常设书记处。

议与中国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第三,随着中国外交政策斗争性的不断提升,中国一直希望在国际上建立一个批判“美帝”、“苏修”的讲坛,并论证自己对外政策的道义性和合法性。亚非人民团结大会这种多边外交活动就为中国提供了这样的讲坛。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外国学者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sup>①</sup>而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还几乎没有,这使得有关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描述远不完善。本文将主要依据中美两国的外交档案并结合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考证和梳理中国参与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例,展现这一时期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演变过程。

## 一、中国对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

1956年后半期至1958年初,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转变为反帝统一战线,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没有最终形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遭遇挫折、美国继续执行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等严峻事实,使中国缓和中美关系的愿望无法实现,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意愿。中国在处理苏共二十大所带来的震荡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唯一途径的普世意义和重要性。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再次团结,又使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对资本主义的压倒性优势,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并对反帝统一战线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因此,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向反帝统一战线转变成为必然。

中国对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转型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对会议的政策及所采取的外交活动既包含着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精神,也带有反帝斗争的色彩。

为了参加这次大会,1957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方针任务》,这份文件成为中国参加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一方面表示中国要“本着求同存异和充分协商的方针,谦虚谨慎,尊重东道国和发起国,自己不居于突出地位”,“坚持体现政策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提出“把主要矛盾集中到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上面

<sup>①</sup>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 David Kimche, *The Afro-Asian Movemen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World*,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3;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hilip Snow, "China and Africa: Consensus and Camouflage",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去,特别集中打击美国侵略集团”。对于会议的决议问题,该文件表示“应尽可能地把有关当前局势的重大问题写进去,以免过分空洞无力。继续发展万隆会议的精神,调子可能超过。”<sup>①</sup>这充分表明中国对大会的政策既带有万隆会议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特点,同时,政策的斗争性也有所提高。

1957年12月26日,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开罗大学体育馆开幕,时任埃及国民议会副议长安瓦尔·萨达特被任命为大会主席。<sup>②</sup>中国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团长为郭沫若,副团长为包尔汉、楚图南,秘书长为廖承志和刘宁一。团员中还包括伊斯兰教人士和文化艺术界的代表。<sup>③</sup>

大会期间,最能体现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精神的行动就是放弃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提案。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台湾问题陷入停顿,会前制定的《关于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方针任务》曾明确谈到“我们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重申我国对台湾问题和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并视当时情况考虑向会议提出一个专门提案。”<sup>④</sup>最终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提案。美国档案显示,会议召开前,美国对会议展开大量的遏制活动,特别是向埃及施加压力。埃及也不希望由于会议的召开导致与美国的尖锐对抗,埃及官员曾向美国驻埃使馆表示,埃及将确保会议的决议各方都能接受。当获悉中国代表团可能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时,纳赛尔曾致电毛泽东,要求不提台湾问题,而中国代表团根据国内的指示放弃了这一提案。<sup>⑤</sup>中国档案显示,在有关政治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曾提到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大会主席萨达特就此问题专门会见了郭沫若。萨达特表示,为达成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提台湾问题,在言词中透露了埃及政府的困难。经与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共同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小组会议中主动提出,不必把台湾问题写在决议中。关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中国表示也可以不必写入。但由于埃及、印度代表团认为必须写上,中国才表示同意。<sup>⑥</sup>最终,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没有涉及台湾问题,而《关于联合国问题的决议》则明确表示“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和正当的地位。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参加,任何重要的国际问题,特别是远东问题,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⑦</sup>中国代表团的这一举动继承了

① 《关于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方针任务》(1957年12月12日),载《关于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方针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004-01(1)。

② 《亚非团结大会前的情况报告》(1957年12月25日),载《亚非团结大会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004-07(1)。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54—255页。

④ 《关于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方针任务》(1957年12月12日)。

⑤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Cairo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 1606, December 28, 1957,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671,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D.

⑥ 《大会情况报导》(1957年12月30日),载《亚非团结大会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004-07(1)。

⑦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29—230页。

中国在万隆会议期间曾秉持的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以及中国支持亚非国家、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政策特点,展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是体现了和平共处色彩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在会议的开始阶段,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被提名为大会文化小组主席候选人。但是为了照顾其他亚非国家,中国代表团最终撤销了楚图南的候选人身份,支持由埃及人担任文化小组的主席,而中方只担任副主席。<sup>①</sup>这说明,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贯彻了不突出自己、保持低调的姿态,避免使自己成为会议主要矛盾一方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与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的作法也是一致的。

根据会前的安排,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做了《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报告谦逊地谈到,许多亚非国家都有独特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积极促进亚非国家彼此的文化交流、团结友好,但这并不等于忽视、当然更不是拒绝同西方各国的文化联系和同西方各国人民的团结友好。相反地,同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应该继续加强。”<sup>②</sup>这种谦虚和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也继承了万隆会议所形成的政策传统,给与会者和媒体以温和的印象。

中国代表团所采取的最具反帝斗争色彩的行动就是阐述反对帝国主义与维护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在大会召开当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社论,文章强调“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殖民主义是战争的温床,帝国主义总是用战争来维持和推行它的殖民制度;消灭殖民主义,也就是消灭战争的一个根源,并加强和平的力量。”<sup>③</sup>这就把消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等同起来。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大会发言指出“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在我们亚非国家来说,就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和保卫和平运动分不开的。”<sup>④</sup>郭沫若的讲话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反帝斗争连接了起来,明确指出反帝斗争是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手段,强调反帝斗争是实现和维护和平的前提和基础。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指出“亚非人民深深知道,在今日的时代,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持久和平的确立,是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分不开的。只有各国人民都获得独立平等,持久和平的稳定局面才可能出现。”<sup>⑤</sup>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和平与斗争的不可分割性。这充分表明,中国此时在

①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Asian-African Solidarity Conference,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 from American Embassy Cair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755, January 31, 1958,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671,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D.

② 楚图南《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1957年12月27日),载《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115—116页。

③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6日。

④ 《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的发言》(1957年12月31日),载《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187—188页。

⑤ 《亚非团结大会的伟大成就》,《人民日报》,1958年1月4日。

亚非国家中强调和平,其目的已经不像万隆会议期间那样是为了打消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而是鼓励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主要是与美国进行斗争,向它们阐明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和平的道理。这是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斗争性开始提高的重要表征。

《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如何措辞是这次大会的核心问题,而与会各国的主要分歧在于要不要在决议中点名批评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最终在中国代表团的支持下,大会《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明确指出“大会认为,巴格达条约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干涉阿拉伯国家独立、损害它们的主权和危及它们的安全的。”<sup>①</sup>埃及代表曾准备在该决议中写入“积极的中立主义是和缓国际局势的最好方法”,但是这一提法遭到了中国的反对,经过与中国代表团的协商,最后决议的文本改为“体现在潘查希拉和万隆十项原则的政策,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结束冷战的最好的方法”。<sup>②</sup>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中国已经将是否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如果不进行斗争而仅仅保持中立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与中国在万隆会议期间团结中立亚非国家的作法已经有很大差距。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设立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及其常设书记处。理事会由各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一名代表组成,而常设书记处由1名总书记和11名书记组成。常设书记处设在开罗,总书记由埃及提名,11名书记分别来自下列国家:喀麦隆、中国、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苏丹、叙利亚和苏联。<sup>③</sup>

综上所述,中国对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既体现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精神,又带有反帝斗争的特色,这表明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斗争性有所提高。

## 二、中国对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

如果说在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前后,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是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向反帝统一战线转变的话,那么到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召开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基本确立。1960年5月中上旬,毛泽东数次向来访的亚非国家外宾阐述了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立场。5月7日,毛泽东对非洲12国代表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sup>④</sup>5月9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23页。

② 《每周通报第114期》(1958年3月17日)载《亚非团结大会情况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004-07(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19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46—247页。

④ 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年5月7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03页。

日,毛泽东对来自西亚的客人明确表示“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sup>①</sup>5月17日,毛泽东又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表示“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sup>②</sup>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国完全不相信还有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可能。另一方面,针对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中国的思考结论是必须坚定地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平共处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成为中国调整对亚非国家政策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对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

1960年4月11日至15日,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中国派出了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为团长,刘宁一、包尔汉为副团长的代表团。

中国在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五个特点。第一,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亚非各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都是英、法、比等西欧国家,而中国显然不希望这些非洲国家把斗争矛头对准前宗主国,而更希望它们能认清美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本质。在会议开幕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这个最善于伪装、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正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大举向非洲扩张。美国帝国主义一面在非洲继续保持着侵略军队和军事基地,并且竭力支持其他殖民国家对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武装镇压;一面又伪装同情非洲人民的独立愿望,以便于它插足进去,取旧殖民国家的地位而代之。”<sup>③</sup>这篇社论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基本观点,即美国想取代旧殖民国家来统治亚洲和非洲,希望亚非国家能够看到美国政策的本质,从而自觉拒绝美国的援助,抵制美国的渗透。此后,指出美国是亚非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就成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有发言的重要主题。中国代表团成员朱子奇在做《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时指出“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亚非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sup>④</sup>中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在发言中也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最恶毒和阴险的敌人。在同其他殖民国家进行斗争的时候,人们必须始终警惕并毫不放松反对美

① 《同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的朋友们交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形势 毛主席说必须结成广泛统一战线战胜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

② 毛泽东《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1960年5月17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16页。

③ 《加强团结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祝贺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31页。

帝国主义的斗争。”<sup>①</sup>大会结束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指出“亚非人民现在越来越认清 帝国主义 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是亚非各国独立、自由与和平的最大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不仅是亚、非、拉丁美洲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sup>②</sup>中国一直认为亚非国家的反帝斗争能够分散中国承受的战略压力,而此时中国的战略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中国自然希望亚非国家能集中“注意力”,从而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中国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 强调肃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亚非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关键步骤。根据会前的安排,由中国负责起草本次大会《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国的这一政策诉求在这份报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常设书记处工作的中国代表在会前建议国内应如何准备报告文稿时就指出,稿子应突出“帝国主义是造成一切社会不安和不幸的根源”,并能够帮助亚非国家鼓舞信心、克服依赖,起到“打针消毒”的作用。<sup>③</sup>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对于亚非各国人民来说,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和结束殖民统治,摆脱和消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控制和束缚,并彻底肃清它在各方面的影响,以便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使社会得到进步。”<sup>④</sup>亚非国家的国情各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不同的,而中国实际上是在亚非国家中求“反帝斗争”之同,存“解决社会问题”的异。

第三,中国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具体措施。根据中国的提议,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决议》中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应该及早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将亚非两洲一切有生力量,如各个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和学术界组织等团结在亚非各国首脑周围。”按照这样的意见,第二次亚非会议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各国首脑的多边会议,而俨然成为一个反帝的大统一战线。《决议》进一步阐明这次会议应该:(1) 建立一个亚非争取解放的联合阵线;(2) 建立一个传播有关反帝斗争的全面和客观情报的机构;(3) 在适当条件下,建立一支亚非志愿军团;(4) 建立互助基金组织。<sup>⑤</sup>以上这四点内容已经完全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了。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除了表现在上述决议中外,还体现在大会通过的宣言当中。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东道国几内亚提交了大会宣言的草稿,中国认为宣言“完全是中立主义论调”,因此表示反对,大会

① 《廖承志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讲话 中国人民永远同亚非人民站在一起 亚非各国人民只要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人民日报》,1960年4月16日。

②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日报》,1960年4月17日。

③ 《二届亚非团结大会筹备工作情况》(1960年3月6日),载《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我代表团出席大会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106-01(1)。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123页。

⑤ 《亚非大会简况》(1960年4月17日),载《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我代表团出席大会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106-01(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5页。



成立了六人小组全面修改了宣言,<sup>①</sup>最终的大会宣言表示“在争取实现和平的新时代的斗争中,亚非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建立新世界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将日益起决定性的作用。”<sup>②</sup>

第四,中国代表团继承了上届大会的政策立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前提和手段。中国代表担任大会和平共处与裁军小组的主席,并负责大会《关于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决议》的定稿工作。经过中国代表团的修改,这份决议表示“遵循万隆会议决议和肃清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统治对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来说,是基本的条件。”<sup>③</sup>这种表述完全继承了中国在上届大会上所强调的反帝斗争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观点。如果说因为大会决议是各国代表都要接受的文件,因此中国在语言表述上还比较谨慎的话,那么,《人民日报》在会后发表的社论更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种斗争与和平不可分割的观点。社论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水火不相容的。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同争取和平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sup>④</sup>

第五,中国反对苏联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节省军费、增加向亚非国家援助的观点。在讨论经济问题的小组会议上,印度代表团提交了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冷战越早结束,国际紧张局势越早缓和,我们实现经济独立的任务就能越早越快的完成。大会坚定地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亚非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实际上印度提交的决议草案是苏联授意的,中国对该草案表示反对,中国代表认为这样的表述将使亚非国家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帝国主义者真心希望我们经济发展,并真的相信裁军和世界和平。这使得苏联代表极为恼火,并大喊“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中国的坚决反对,以上表述最终没有被写进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sup>⑤</sup>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决定采取反击措施。早在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闭幕后,中国和苏联对于常设书记处设在开罗、总书记由埃及人担任感到不满。在本届大会期间,苏联曾提议中苏共同提出取消总书记、由各国轮流担任执行书记的建议,中国同意与苏联采取一致行动。而在中国反对印度草案后,当中国在讨论组织问题的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些建议时,苏联不但没有和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反而把中苏商谈的情况透露给埃及。埃及则动员一些代表团表示,会议决议的反帝调子太高,必须修改。为了争取通过那些带有

① 《关于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22日),载《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我代表团出席大会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106-01(1)。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

③ 同上,第25页。

④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人民日报》,1960年4月17日。

⑤ “Sino-Soviet ‘Clash’ at Afro-Asian Solidarity Conference in Conakry,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 from American Embassy New Delh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108, May 6, 1960,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Decimal File 1960-63, Box 1377,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D.

反帝色彩的决议,中国不得不对埃及做出让步,表示常设书记处仍设在开罗,总书记仍由埃及人担任,这才使会议的各项决议最终获得通过。<sup>①</sup>

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决定建立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该组织成为亚非团结运动的组织机构。大会通过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章程(草案)》,章程规定,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共下设四个机构,分别是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常设书记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常设书记处由12人组成,包括总书记1人,书记11人。<sup>②</sup>11名书记由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苏联等国代表担任,埃及的代表担任书记处总书记,书记处也继续设在开罗。<sup>③</sup>

### 三、中国对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

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闭幕后,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继续发展,一方面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政策被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被持续加以强调;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在亚非国家面前公开批评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并试图将苏联的影响清除出亚非地区。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中国亚非政策中的反修色彩只是初露萌芽,那么现在与苏联对抗已经成为中国考虑自己亚非政策的最重要因素。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跟美帝的矛盾是个主要矛盾,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始进入到‘短兵相接’的阶段。”<sup>④</sup>同年11月举行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sup>⑤</sup>中国这种政策变化又集中体现到批判所谓“三和一少”错误路线上。196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对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和建议,这些看法和意见却被错误定性为“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sup>⑥</sup>王稼祥的建议很多内容都涉及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对他的批判不但无法遏止不断提高的中国亚非政策的斗争性,反而加速其发展。这种状况也必然影响中国参与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外交活动。

在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筹备期间,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有两个,即书记处总报告如何表述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和大会观察员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得较为顺

① 《关于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22日)。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99—303页。

③ 《亚非人民高举反帝旗帜昂首前进 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自由和独立的呼声中胜利闭幕 通过一系列决议号召加强团结彻底粉碎帝国主义一切阴谋》,《人民日报》,1960年4月17日。

④ 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外交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⑤ 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9—370页。

⑥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0、493—494页。

利,总报告表示“亚非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殷切地关怀中印边界问题,真诚地希望这一问题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sup>①</sup>在第二个问题上,中苏两国则发生了激烈冲突。苏联要求邀请东欧国家和它控制的一些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而中国对此坚决反对。<sup>②</sup>最终,各方同意邀请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联和国际民主妇联为观察员,而东欧国家一个都不请,问题才得以暂时解决。<sup>③</sup>

1962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出席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请示报告》,该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报告》首先指出这次会议“是当前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在亚非地区群众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一场严重的斗争”。《报告》再次强调要团结各方力量,“集中对付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并明确表示中国“要采取攻势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要坚持斗争到底,不怕公开,不怕分裂,如他点我们的名,我们也点他的名。”《报告》还谈到“在反美和民族独立两个根本问题上,用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亚非和世界人民的敌人,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用适当的方式揭露现代修正主义,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妥协,用原则做交易,不许人民反帝,诬蔑和破坏民族独立运动。”<sup>④</sup>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中国已经有与苏联争夺对亚非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同时,苏联成为中国在国际会议上首要和直接的批评对象,中国对苏联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美国的关注。将苏联排除出反帝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中国既定的政策目标。

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63年2月4日至11日在坦噶尼喀的小城莫希举行。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三项重点工作:第一,继续反对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第二,反对印度提出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草案;第三,支持古巴成为三洲会议的东道国,并将苏联主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排除在三洲会议的筹备工作之外。

以刘宁一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希后,就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的气氛是良好的,但当苏联代表团谈到邀请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苏联表示东欧国家是支持亚非团结运动的,这些国家作为观察员有利于阻止英美的渗透。而刘宁一则表示,这涉及一个原则问题,如果今天请了一些东欧国家,那么,西欧和美洲国家就都可以要求来参加,会议就不成其为亚非会议了。他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52页。

② 《关于大会邀请东欧观察员事》(1963年1月18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关于第三届亚洲非洲人民团结大会会议延期召开及邀请观察员问题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833-03。

③ 《关于邀请观察员事》(1962年12月18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关于第三届亚洲非洲人民团结大会会议延期召开及邀请观察员问题电》;《报告有关大会情况》(1963年1月24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关于第三届亚洲非洲人民团结大会会议筹备及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情况往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834-03。

④ 《关于出席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请示报告》(1962年12月13日),载《关于参加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请示报告和会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834-04。

特别谈到,对于阻止英美的渗透,“我们对苏联朋友就没信心。你们苏联就是怕美国。美国人是你们的上宾”。当苏联继续坚持己见后,刘宁一表示苏联的作法就是挑起争吵、破坏会议,进而指出苏联行动的目的就是反华,<sup>①</sup>这样会谈不欢而散。会议开幕后,在一次团长会议上,在中国代表团的坚决支持下,大会否决了邀请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的提案,并决定出席会议的观察员中,除古巴等三个观察员外,均不得在大会上讲话。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后,经过各小组投票表决,观察员国也一律不准进入小组会场。<sup>②</sup>至此,东欧国家观察员问题才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开始后率先表示不愿把中印分歧带到大会上来,不会主动提出中印边界问题,中国的态度得到了东道国和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赏和支持。但是,在2月7日的小组会议上,印度代表还是提出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代表团当即表示不能讨论这个问题。小组会议主席也认为应撤销这个草案,对此,其他代表也予以支持。会后,东道国坦噶尼喀和埃及、几内亚等国代表与中国代表团协商,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够接受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偏袒印度的作法,坚决不能同意。大会主席表示,是否可完全照抄书记处总报告中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词句,做一个决议。刘宁一表示只能就亚非各国的边界问题做一个笼统的分决议,要求亚非各国根据万隆原则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最终协商无果而终。<sup>③</sup>2月10日,大会闭幕在即,如何在大会文件中表述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坦噶尼喀、埃及、几内亚等国代表再次与中国代表团协商。此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把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改为大会主席向会议提出的口头建议,文句照抄书记处总报告,<sup>④</sup>这才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在本次大会召开前,中国就确定了“要在古巴问题上大做文章”的立场,<sup>⑤</sup>之所以要如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行动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而古苏关系也因此陷入低谷。中国希望通过支持古巴来羞辱苏联,从而降低苏联在亚非国家当中的威信。大会召开前,中国就曾建议常设书记处发表支持古巴的声明。在声明的草拟过程中,中国书记又力主从声明中删除粉饰苏联妥协行动的词句,并最终

① 《出席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同苏联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2月2日)载《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三届亚非团结会议情况有关情况(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9-03318-03。

② 《刘宁一同志关于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斗争情况的报告》(1963年2月8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关于拜会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情况和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8-00320-02;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pp. 41-42。

③ 《刘宁一同志关于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斗争情况的报告》(1963年2月8日)。

④ 《刘宁一同志关于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最后结果的简报》(1963年2月10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关于拜会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情况和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情况的报告》;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p. 42。

⑤ 《关于出席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请示报告》(1962年12月13日)。

于 1962 年 12 月 3 日通过了这项声明。<sup>①</sup> 随后,在起草书记处总报告时,苏联反对在报告中明确表示支持古巴,中国决定对苏联的做法“给以痛击”,最后,书记处总报告又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表示了明确的支持。<sup>②</sup>

大会开幕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讲话中建议亚非各国“支持英勇的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sup>③</sup> 参加大会的古巴观察员在发言中重申了古巴在 1961 年提出的邀请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到哈瓦那召开一次亚非拉三大洲人民会议的建议,古巴观察员发言后,刘宁一特意与他热烈拥抱,表示支持。<sup>④</sup> 此时,古苏关系正处于低谷,任何增加古巴国际声望的举动都是苏联所不愿意看到的。苏联首先企图阻止古巴观察员提出的在哈瓦那召开三洲会议的建议,但没有成功。苏联又希望世界和平理事会观察员能够参加讨论三洲会议的小组会议,也遭到了拒绝。<sup>⑤</sup> 苏联的第三个步骤是试图在关于三洲会议的决议中写进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负责筹备会议,而这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是受苏联控制的国际组织,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筹备三洲会议,必将使苏联把持会议的主导权。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三大洲会议的特别决议》。《决议》明确支持在哈瓦那举行三洲会议,并决定由亚非拉三大洲各选出六个国家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sup>⑥</sup> 这样就完全把世界和平理事会排除在了三洲大会的筹备工作之外。

至此,中国在会议上的三件重点工作基本得到圆满完成。但是,中苏之间的分歧也愈来愈明显地摆在了广大亚非国家面前,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已经从一个促进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机制,逐渐转变为中苏两国争夺亚非国家、辩论是谁代表马列主义的舞台。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有这样的表述“不揭穿现代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就不可能扩大和巩固各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不可能取得反帝斗争的更大胜利。”<sup>⑦</sup> 反对修正主义已成为击败帝国主义的前提条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成为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一个反帝、反修并重的统一战线即将成为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基轴。

## 四、中国对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

从 1963 年到 1965 年,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斗争性已经达到顶峰,反帝、反修

① 《关于支持古巴五点要求的声明讨论通过情况》(1962 年 12 月 5 日),载《关于第三届亚非团结大会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档号:109-03167-02。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 52 页。

③ 《在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四日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的讲话(全文)》,《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7 日。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 313 页。

⑤ 《关于召开三洲大会决议的斗争情况》(1963 年 2 月 17 日),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关于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会议情况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档号:108-00834-02。

⑥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 313 页。

⑦ 《加强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斗争》,《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13 日。

并重的政策最终形成。一方面,中国日益强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1964年1月,毛泽东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sup>①</sup>同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也阐述了相同的政策立场。<sup>②</sup>另一方面,莫斯科三月会议使中苏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反帝必反修的政策最终得到确定。1965年3月,中国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长篇文章。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写道:“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sup>③</sup>6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更明确表示“修正主义从来就是帝国主义的社会支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力量。要反对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sup>④</sup>以这两篇文章为标志,中国已经完全确立了在亚非国家建立反帝、反修并重的统一战线政策。

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65年5月9日至16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小城温尼巴举行。一方面,中苏两国的争斗在会议的各个领域展开;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美军已经在越南岷港登陆,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成为中国的另一个政策重点。中国对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明显呈现出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开弓”的特点。

5月9日,大会开幕,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致开幕词。中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的发言主要围绕越南战争展开。发言一方面高度评价越南抗美斗争的意义,指出越南人民的斗争“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支持”。另一方面发言也不点名批评了苏联对越南战争的政策,指出苏联对越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捞取资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交易”。在此基础上,发言号召全世界人民结成一条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同时再次强调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论调“已经破产”。<sup>⑤</sup>廖承志的发言作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的立场性文件从整体上体现出“两面开弓”的特点。

① 《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人民日报》,1964年1月13日。

②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③ 毛泽东《关于〈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5年3月23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47—348页。

④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⑤ 《亚非人民行动起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斗争》,《人民日报》,1965年5月13日。

从5月12日开始,大会分为组织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社会文化委员会进行讨论,进入到闭门会议阶段。中苏两国的分歧几乎在所有委员会会议中都暴露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问题上:

首先是东欧国家观察员问题。在大会开始前,中国一直反对允许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但未能奏效。在组织委员会上,中国又提出在未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会议中不允许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出席。最终,组织委员会做出决议,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只能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而不能参加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和理事会会议。随后,中国又提出驱逐两名南斯拉夫观察员,理由是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

其次是建立经济组织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提议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下面建立一个经济组织来探讨解决亚非国家的经济问题。因为苏联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正式成员,因此中国更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之外的亚非经济组织,从而排除苏联的影响。苏联则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建议。当经济委员会表决阿尔及利亚的建议时,17个参加国中只有四国支持中国的立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表示保留在大会上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并声明不能对这一未来的经济组织负任何责任。<sup>②</sup>

第三是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召开时正值中国为第二次亚非会议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进入高潮的时期。对于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最根本的立场之一就是反对苏联与会。印度代表团团长却在大会发言时表示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因为“苏联主要是个亚洲国家”。<sup>③</sup>印度代表的发言与中国的立场尖锐对立,因此,中国代表团在政治委员会上发表声明指出,亚非人民团结运动是个民间的运动,它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干涉或影响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若要求大会为某个国家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制造舆论或做出决定,只能使会议和亚非人民团结运动陷于分裂。大会闭幕前夕,又有人提出在总宣言中加入暗示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词句,由于遭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没有成功。<sup>④</sup>

第四,在究竟由谁代表锡兰和喀麦隆的问题上,中苏两国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大会期间,分别有两个锡兰代表团和两个喀麦隆代表团抵达加纳,他们都声称自己代表本国的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应该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都

① “Fourth AAPSO Conference at Winneba: Part I—Summary and Comment, Air 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Accr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A 472, June 6, 1965,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1964—1966, Box 1551, National Archive, College Park, MD.

② *Ibid.*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260页。

④ 新华社《温尼巴大会高举亚非团结反对美帝的旗帜坚决唾弃苏联代表团兜售的分裂投降路线》(1965年5月19日),载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433页。

是中国支持其中一个代表团,而苏联支持另一个,双方争执不下。<sup>①</sup>

第五,在接纳新成员问题上,也往往是苏联支持某国一派政治势力作为新成员加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而中国则支持另一派政治势力。如已经是组织正式成员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接纳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为新成员。对此,苏联支持前者,而中国支持后者。<sup>②</sup>

最后是关于下届大会地点问题。北京、新德里和开罗都成为下届大会的可能地点。苏联支持新德里和开罗,组织委员会关于下届大会地点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晚上,最终阿尔及利亚由支持开罗转为支持北京,北京才最后胜出。<sup>③</sup>

对于大会的决议,中国比较关注的是三个问题:和平共处问题、谴责联合国问题和反对约翰逊政府提出的与越南北方无条件谈判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秉持坚定鲜明的反美立场,最终大会决议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政策立场,带有较强的反美色彩。

对于和平共处问题,《大会总宣言》表示“只有不干涉的原则才能使和平共处原则成为可为人类大多数所接受的现实。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和平共处就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挠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sup>④</sup>大会《总政治决议》还特别谈到“亚非各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用革命的暴力来回答帝国主义的暴力,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sup>⑤</sup>《大会总宣言》和《总政治决议》的这些词句支持了中国的观点。

对于联合国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大会应当严正谴责联合国对亚非人民所犯的罪行。联合国应该立即改正错误,彻底改组,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否则,就可以考虑另外建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sup>⑥</sup>这段话体现了中国对于联合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大会《总政治决议》部分接纳了中国的观点,《决议》谴责美国把联合国变成它的工具,要求联合国改正它的错误,否则就要改组它。<sup>⑦</sup>但是,《决议》并没有谈到“联合国的罪行”,也没有提出组建新的革命的联合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对于约翰逊政府提出的与越南北方无条件谈判问题,廖承志在讲话中表示:所谓无条件谈判,“就是要在美帝国主义的屠刀下,承认美国侵略越南是合法的,美国可以任意撕毁《日内瓦协议》,永远割裂越南,赖在越南南方不走,继续奴役和屠杀越

① “Fourth AAPSO Conference at Winneba: Part I-Summary and Comment, Air 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Accr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② *Ibid.*

③ *Ibid.*

④ 《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总宣言》,载《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2页。

⑤ 《总政治决议》,载《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第9页。

⑥ 《亚非人民行动起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斗争》。

⑦ 《总政治决议》,第9页。



南南方人民,任意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因此,无条件谈判是“根本违背越南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是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sup>①</sup>但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没有谴责美国政府关于无条件谈判的建议,在这一点上,中国没能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中国代表团表示一些国家是上了帝国主义关于和平谈判宣传的当。<sup>②</sup>

除政治性决议外,大会还决定于 1967 年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但是,1967 年 2 月,在苏联的控制下,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第八届会议推翻了早前作出的在北京举行第五届大会的决议,宣布第五届大会改在阿尔及尔举行。3 月 17 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今后不再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及其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联系,<sup>③</sup>中国与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关系就此结束。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既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在阿尔及尔召开,而是一直推迟到 1972 年才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sup>④</sup>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至今仍然存在,但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当年。

综上所述,1957 年至 1965 年,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表明,和平共处原则的地位在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中开始下降,而团结反帝原则的地位开始上升。同时,反修斗争的重要性也不断强化,最终取得了与团结反帝原则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在万隆会议后出现了一个激进化的趋向,具体表现为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演变为反帝统一战线,再转变为反帝、反修并重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这种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中苏大国关系的互动。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就是 1957 年至 1965 年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逐渐演变的具体反映和表现。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亚非人民行动起来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斗争》。

② “Fourth AAPSO Conference at Winneba: Part I - Summary and Comment, Air 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Accr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③ 《我亚非团结会强烈谴责苏修分裂亚非人民团结反帝运动 重申第五届亚非团结大会今年在北京召开 中国筹委会正式成立,决心同亚非朋友一起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宣布不再同苏修操纵的亚非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人民日报》,1967 年 3 月 18 日。

④ The AAPSO Permanent Secretariat,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 A. P. S. O.” 25 Years of Struggle*, Cairo Egypt, October, 1982, p. 91.